

应用语言学的 历史及理论

于根元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

于根元 著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于根元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ISBN 978 - 7 - 100 - 05682 - 3

I. 应… II. 于… III. 应用语言学—文集 IV. H0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780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YINGYONGYUYANXUE DE LISHI JI LILUN

应用语言学的历史及理论

于根元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05682 - 3

2009年2月第1版

开本 850 × 1168 1/32

2009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1/4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20 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	(1)
语言规划和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10)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语言热点问题大讨论	(21)
网络语言冲击波	(48)
关于“语言全息发展论”	(60)
说“联想”	(65)
应用语言学的基本理论	(79)
语言的本质和语言教学	(91)
关于语言内核外层互补说	(102)
语言是开放的梯形结构	(111)
应用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	(124)
应用语言学前沿问题说略	(157)
关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若干认识	(174)
关于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	(194)
制订语言计划的若干原则	(196)
关于新时期推广普通话方略的若干思考	(201)
“消极规范”和“积极规范”	(216)
语言传意和传意者	(219)

新词新语和语言规范·····	(226)
整理汉语新词语的若干思考·····	(233)
说“友”·····	(244)
词语的时空分布·····	(250)
整理网络词语的若干思考·····	(259)
关于媒体语言研究的若干思考·····	(270)
后记·····	(279)

20 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源远流长,而独立学科的形成很晚。从世界范围来说,19 世纪末叶,J. N. 博杜恩·德·库尔德内提出了应用语言学这个概念,而独立的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 1964 年第一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在法国召开和国际应用语言学会成立。中国应用语言学科形成的标志是 1984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成立和 1992 年《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创刊。

应用语言学分狭义、广义两种,中国一般取广义的,包括语言应用的各个方面,范围是开放的。但是包括范围和内部分类有几种意见。现在比较通行的主要指四大块:一是语言教学,二是语言学和现代科技的结合,三是广义的社会语言学,四是语言计划。

20 世纪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在与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研究的结合方面几乎转了一圈。20 世纪之前,相当粗的来说,中国侧重应用语言学研究,层次比较低,忽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研究。另外一个侧面是结合汉语实际,忽视向外国的借鉴。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开始形成了一个弯度,重视了语言本体研究和普

通语言学研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另外一个侧面,重视向外国借鉴,在结合汉语实际方面有些偏差。因为忽视了应用语言学研究,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也受到限制。应用语言学研究受到冷落,但是几千年来重视应用语言学的传统还在发挥很大的作用,实际语言生活里有许多问题需要应用语言学研究解决。应用语言学研究又受到语言本体研究和普通语言学研究以积极成分为主的影响,有了或者孕育着进步。20世纪,可以说是这样的历史:应用语言学研究同语言本体研究、普通语言学研究苦苦地探求高层次的结合,在探求的路上摇摇摆摆地前进。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正在出现的高层次的结合,是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进入新时期的重要使命和重要标志。

二

20世纪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1894—1912)。二是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1912—1949)。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实行改革开放(1949—1978)。四是实行改革开放到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1978—)。

第一个时期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从语文学进入了语言学,或者说是从语言学进入了现代语言学。

第二个时期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白话文运动开展的。可以概括为三个运动。第一个运动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是白话文要取得书面语的正统地位。取得成绩的主要条件和经验是:1. 客观上符合语言发展本身的规律;2. 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3. 有强有

力的杂志《新青年》和强有力的主编陈独秀；4. 有创作实绩；5. 倡导者是一批有影响的学者。问题是：1. 简单化；2. 不很重视理论建设；3. 行文半文半白，过于欧化。第二个运动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众语运动。因为半文半白，过于欧化，不好懂，给了复古派反对白话文的可乘之机。此后，陈望道等提出大众语。积极方面是：1. 提出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提出语言要浅显易懂，交际要看对象；2. 开展建设普通话的讨论，认识有了进步，关于口语和书面语关系的提法也有进步；3. 有陈望道这一批语言学家唱主角。问题是：1. 批评白话文过了头；2. 瞿秋白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第三个运动是五四时期和 30 年代的国语运动。1932 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国音常用字汇》，标志着北京语音的音系作为普通话语音标准事实上基本确立。

第三个时期的应用语言学研究，主要是围绕语文知识大普及开展的。语文知识大普及有这样一些社会背景：一是 40 年代延安整风，解放区重视语文学习，全国解放是原来解放区的扩展，全国重视语文学习。二是全国逐渐转入建设，语文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工作的需要，以及受苏联的影响，重视对干部的语文要求。四是新中国成立，在世界上要树立自尊的形象，语文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形象。五是工农大众文化上翻身，大量使用语文，迫切需要普及语文知识。《人民日报》1951 年 6 月 6 日开始连载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并且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和这篇社论有很大的功绩，教育了一两代人。问题是：1. 不正确地说毛泽东、鲁迅的语言“一字不易”。2. 形成了规范化主要是“匡谬正俗”的片面化倾向。3. 对不少语言现象判断过严过早。4. 不正确地提出“纯洁语言”的口号。正面和负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1955 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的语言文字应用研究进入了第一个黄金阶段。推广普通话确定了标准和工作方针,现代汉语规范化确定了规范的含义、态度和主要任务。会议的文集和1955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为促进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是珍贵的研究成果。语文教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试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经过1955年的试教,1956年在全国全面推开。进入60年代之后,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试验很难开展,1966年进入了长达十年的停顿和遭受破坏的阶段。

第四个时期的初期是恢复阶段,1986年1月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后进入了再发展阶段。初期的主要成果是关于语言美的讨论和研究,语言学界几乎是总动员,北京语言学会编的《礼貌和礼貌语言》(北京出版社,1982)和陈章太、于根元的《语言美和精神文明建设》(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是突出的成果。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是中国制定语言规划的重要典范,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了新时期。会议讨论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解决了历史上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把现代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列为第一项任务,没有明确重申汉语拼音文字方向,不把简化汉字单独列为一项任务。提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分三级的要求。理论上强调了语言的科学性和社会性,提出语文工作要“顺乎自然,因势利导,做促进工作”。

此后的推广普通话研究,1993年决定以必修课的形式在全国的师范院校开设“教师口语”课程,语文出版社等出版了多种有关教材。80年代后期开始,陆续推出了普通话水平测试研究的成果。语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陈章太、李行健主编的《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

汇集》，是普通话词汇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詹伯慧、于根元在推广普通话的理论研究方面有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李如龙、姚佑椿、汪慧君、易洪川等分别对福建、上海、合肥、武汉等地的地方普通话进行了调查研究。

现代汉语规范研究方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写的《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1996年出版了修订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广大学者对现代汉语规范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冷静的思考和多次深入的讨论，吕叔湘、陈建民、李如龙、邢福义、于根元、王希杰、戴昭铭、郑远汉、龚千炎、周洪波、储泽祥、施春宏、庄莹、郭龙生、李建国、季恒铨、王铁琨等陆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些见解主要发表在《中国语文》《语言文字应用》《语文建设》《学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研究》等杂志上，主要有：1. 交际值是衡量规范的原则。2. 规范就是服务。3. 发现和推荐新的好的语言现象更重要。4. 语言中有大量的中介状态。5. 不同风格的语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6. 区分学习语言的过渡状态和语病。7. 对待规范的态度刚柔相济。8. 从语义、结构、色彩、节律、语用等多角度地分析规范。9. 色彩是个动态的系统。10. 语言变化具有惯性。11. 规范具有层次性。12. 语言始终处在潜与显的过程中。13. 预测观是重要的规范观。14. 语言表达具有功力、思维、情趣三要素。15. 从规范评议失误中研究规范。

语文教育方面开展了多次讨论，总的成果是对于需要加强素质教育和语言应用的教育，基本上成为共识。庄文中有一系列的研究。语言能力的研究是目前的热点和重点，北京市教育局组织了课题组，刘大为、巢宗祺发表了《两种能力的课程分化——关于“现代汉语”教学改革思考》（《语言文字应用》1995年第2期），王培光出版了《语

言能力与中文教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王建华的《语用学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是探索中学语文教学理论的重要成果。吕必松的《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是介绍和论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的权威之作。盛炎的《语言教学原理》(重庆出版社,1990)是中国对外汉语教学理论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的力作。李宇明的《儿童语言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是儿童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

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学科和研究领域。计算语言学研究引起重视,特别是中文信息处理的词汇问题开始了集中的研究,冯志伟、陆汝占、黄昌宁等在这方面有较多的成果。吴宗济、曹剑芬等在语音实验方面有较多的成果。

社会语言学研究赢得了显著的地位。陈原、王宗炎、陈章太、陈建民、戴庆厦、蔡富有、张公瑾、陈松岑、苏金智等在总论等方面有显著的成果。陈建民等在口语研究方面,陈建民、李如龙、曹志耘、申小龙、邢福义、戴昭铭等在文化语言学研究方面,陈恩泉、徐思益、李如龙、高莉琴等在双语双方言研究方面,李明洁在称谓研究方面,张清常在北京街巷名称研究方面,周国光等在体态语研究方面有显著的成果。

文学作品语言和语言风格研究,程祥徽、黎运汉、郑远汉、张德明、于根元、刘一玲、李熙宗、王建华等有重要的成果。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程祥徽、黎运汉主编的《语言风格论集》,收录的几乎都是中国这方面顶尖学者的论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汉语现代风格学研究的许多重要方面的重要成果。

新词新语研究成为热点。从呼吁、写札记、编词典,到进行理论探索,有了迅速的发展,而且成为探讨规范观、语言观更新的排头兵。

沈孟璁、闵家骥、韩敬体、王铁琨、陈光磊、王希杰、程祥徽等作出了贡献。于根元、刘一玲、周洪波长期进行多年本词典、编年本词典编写和理论研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已经成为中国新词新语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基地。田小琳多次提出“社区词”的概念，并且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对整个词汇研究会有重要的影响。

曹志耘的《广告语言艺术》(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广告语言研究”课题组的系列成果,于根元主编的《广告语言教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张颂主编的《中国播音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4),林兴仁的《广播的语言艺术》(语文出版社,1994),吴为章的《广播电视话语研究选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吴郁的《节目主持艺术探》(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姚喜双的《播音学概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邱大任的《语言识别》(群众出版社,1995),王洁主编的《法律语言学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张红英的《公安语言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李元授的《新闻信息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是各自研究方面的主要著作。

1997年12月又一次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12年来的工作和主要经验,部署了跨世纪的工作任务,提出语言文字不搞“纯而又纯”,语言生活要主体化和多样化相结合,语言文字工作重在建设,语言文字工作特别要重视政策,这些都是对应用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贡献。

这个时期,在应用语言学理论研究方面有了重要的突破。过去比较长的时期有两个很有影响的说法,一个是应用语言学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本身是没有理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是中国本身是没有语言学理论的,都是从外国来的。这个时期提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

语言和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结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普遍性、特殊性的学科”，应用语言学总结规律，也有理论、原则、方法。这个认识调整了语言学内部的分类：语言学里分语言本体研究、应用语言学，两者都有理论，总的是语言学理论，属于前者的基础部分是普通语言学，属于后者的是应用语言学理论，其中又分应用语言学基础理论和应用语言学技术理论等。过去的普通语言学里包含了一部分应用语言学理论，需要分出来，但是两者还是需要交叉的部分。还提出应用语言学理论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主要来自语言生活实际。中国的部分学者梳理了中国在应用语言学理论方面的贡献，出版了于根元主编的《应用语言学理论纲要》（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部分学者开展了语言观的讨论，主要是《语言文字应用》1994—1996年的讨论、于根元等的《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

这个时期在建立研究机构、创办研究杂志、设置课题、培养队伍等方面，都有一些实践和研究。1995年12月筹建了中国应用语言学会。

三

中国20世纪应用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经验是语言工作和研究为了国家的富强，所以跟政治、经济、文化结合在一起。语言工作者和研究者有很强的责任感。主要教训是这方面的分寸没有掌握好，对语言内部的特点认识不够，简单化，语言工作和研究往往一定程度地淹没在政治等里面，有时候又单打一。因为简单化，急于求成，对队

伍建设、实际调查和理论研究总是认识不够、投入不够。

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当前特别要重视理论研究。这方面同外国的差距,主要不在理论的高度,而在于细化、专题化、大量应用、便于操作。中国目前的不足是理论的创新、开拓,同细化、专题化等的交接方面。这些工作需要一大批人来做,要有计划地培养一支高水平的应用语言学的理论队伍。而队伍建设需要花时间,需要适度超前,又不容易很快产生独立的效应,容易被忽视。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徘徊不前和空前大发展的两种前途都是存在的。关键是看队伍建设和应用语言理论建设是否真正发展了。

参考文献

刘涌泉《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应用语言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460—46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仲哲明《应用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展望(上)》,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和展望》218—261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

傅永和等《应用语言学研究现状和展望(下)》,同上,262—293页。

于根元《20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书海出版社,1996。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8年第4期;删节后又刊《科学时报》1999年3月10日)

语言规划和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

最近我们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有一位老师要出国讲学,她觉得到了外国人家可能会问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和研究的情况,以及一些方针政策的问题,就来问我。我给她谈了一些最基本的内容,我觉得掌握这些就差不多了。我想起20世纪大概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一批要出国教汉语的教师在语言文化大学集训,有关同志也请陈章太和我去谈过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很多人都可能同外国朋友打交道,外国朋友很可能问起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个基本的了解还是很有用处的。

其实,我们在国内教学,在“应用语言学”课里要谈这些问题,在“现代汉语”课的绪论里也要谈这些问题。做研究等工作,也要了解这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还有一些同行,对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为什么没有明确重申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文字方向,一点也不了解。前不久还有个语文刊物在编辑部的文章里说要纯洁语言,看来也是不看1997年又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的。我们对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宣传可能做得也不够。

要我来谈这方面的问题,我很高兴。我在这方面做过研究,也做

* 本文是2000年6月16日作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应用语言学系列讲座上的讲稿。

过实际工作。我参加了两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都是重要成员。头一次会议期间，我还是文件起草组组长。这两次会议是我国制定语言规划的两个重要典范，我今天主要谈这两次会议，用两次会议把有关的情况和想法串起来。

一 1986年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

(一)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

1986年1月6日到13日，国家教委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会议的文件刊登在《语文建设》1986年第1、2期合刊上，还出了个会议文件汇编《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语文出版社1987年出版。我们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时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一开会学习了中央确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第二次会议还是提这个方针。方针是这么说的：

全面贯彻、执行国家关于语言文字工作的政策和法令，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段话的核心是“促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这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主要内容。“继续推动文字改革工作”这句话本来是考虑到跟原来工作的连续关系，因为语言文字工作已经包含文字改革工作了。后来觉得写这句话很有必要，因为确实有一些很有影响的人是对简化汉字、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工作都抱否定态度的。最后一句话“使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很重要,这是我们语言文字工作及研究、教学的出发点、目的和目标,是检验我们语言文字工作及研究、教学的标尺。这里也体现了我们的语言观,就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建设者服务,而且重在建设。

(二)推广普通话列为首要的任务

中央确定的一段时间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把推广普通话列在首位。首先是同原来文字改革的其他工作相比,这项工作突出了。此外,原来的文字改革工作,抓一个突破点有利于工作开展。比来比去,推广普通话工作容易带动其他工作,也比较容易开展。

推广普通话列为首要的任务,这差不多是会前大家都赞成的。可是,它带来的冲击波,不是会前大家都有准备的。例如,原来推广普通话是为了将来实行汉语拼音文字的,是从属于文字改革工作的。现在列为首要的任务,它有自身的意义,而且是属于语言方面的。加上那时候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工作已经有了信息处理,范围扩大了,再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不怎么合适了,我们准备开的会叫第二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也不怎么合适了。所以,推广普通话列为首要的任务,还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催化剂。关于这个改名,那时候包括会上有一些人想不通,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是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积极分子。我总觉得,我们有了方针里说的那个出发点、目的和目标,不同认识总好办。那时候还有一些别的不同认识,我们没有批判人家,没有用中央的批示来压人家。我们是很尊重人家的,是出自内心的。因为人家的出发点、目的和目标总是对的,人家长期以来的工作是很艰难也是很有功劳的。看到他们那样坚持,他们有的还发火,我还佩服他们那种骨气和科学工作者的品格。有人是要批判和处分人家的,但是被多数人巧妙地